



鉴古察今的《资治通鉴》

□ 丁万明

以史资政第一书

《资治通鉴》是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及其助手历时19年编写而成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宋神宗皇帝因此书“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资治通鉴》序（宋神宗）御制》），据《诗经》“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资于治道之意，特命名为《资治通鉴》。全书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以来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十六个王朝共1362年的历史，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史学巨著。

明末思想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深研细读，评价其“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资，失亦可资也，同可资，异亦可资也。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读通鉴论·卷末叙论二》）就是说：《资治通鉴》从前代社稷安危的经验教训中，看到忧患得失，由此来安排自己的行为以去危存安；从古人民情政事的利害得失中，替他们斟酌思量，以达到对当下兴利除害的目的。经验可以借鉴，教训也可以成为镜鉴，相似的可以借鉴，不同的也可以作为借鉴。所以治理可以借鉴的，就在于专注，而历史尤为值得珍视。

借鉴历史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仅要知其所以然，还有进一步探究其何以不然。只有这样探究，才可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历史读活。

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他写史的视角聚焦于“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者”，一部《资治通鉴》，处处以“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为归依指向，因而对后人参政为官甚至为人处世都极其重要。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对其精研细读。康乾盛世的缔造者康熙提出了“共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安，治乱于未乱。夙夜孜孜，寢寢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康熙遗诏》）的施政纲领。这部书传递的思想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正能量，没有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

《资治通鉴》是承载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是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必读书。然而由于编写体例的缘故，《资治通鉴》自古以来“号为难读”。在其问世的头

17年里，只有一个叫王胜之的人通读了一遍。司马光曾经对人说：“自吾为《资治通鉴》，人多欲求观读，未终一纸，已欠伸思睡。能阅之终篇者，唯王胜之耳”（《宋史卷286·王曙传》）。尽管难读，历代政治家和学者都对其精研细读。作为一代名臣，曾国藩的一生深受《资治通鉴》影响，他认为六经之外有七书（七书指《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即为此七书之一。

名分论和才德论

《资治通鉴》的真谛何在？换句话说，司马光通过《资治通鉴》最想传达给后世为政者的思想究竟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以“礼治文化”为中心，以“名份论”和“才德论”为基本点。

《资治通鉴》全书共有218条史论。为了表明自己的历史见识，司马光不仅引用了前人的史论，而且自己亲自撰写了其中的119条“臣光曰”。《资治通鉴》的第一篇“臣光曰”就奠定了全书的理论基调。司马光在第一篇“臣光曰”中指出，作天子的最大的职责就是维护礼的神圣性。而恪守礼的关键在于维护名分的合法性。“礼”就是传统社会的纲常，“分”维护的就是统治的合法性，“名”则是安定政治秩序的关键。什么是“名分”？“名”是身份的表称，“分”是欲望的限度。它的意思就是有什么样的身份，就只应享有什么样的待遇。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如果是在上位的人给予在下位的，就是泛滥用礼；如果是在下位的享受了不该享受的，就是僭越用礼。“名分”就是一道无形的藩篱，它告诫社会各阶层：千万不可超越礼。因为，“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靡灭几尽，岂不哀哉”（《资治通鉴·周纪》）。概而言之，中国传统社会维护的是一种差序格局，司马光认为“礼”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法宝，礼乐教化、纲常名分是国家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

中华民族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被称为礼义之邦，我们的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但自从汉高祖刘邦任用叔孙通制礼作乐，叔孙通一味迎合刘邦，礼就失去了它的高贵地位。司马光认为，礼不仅是朝堂上的一套繁文缛节，使人们在厅堂之上守秩序有规矩，而且在朝堂之外具有很大的作用。对于个人来说，它能让人干什么事都有法度，从而事能成；对于一个家族来说，礼可以让家族中人按照亲疏远近的不同来相处，从而使九族和睦；对于一个乡村来说，礼能够使人们都按照伦理法度以礼相待，

使风俗敦厚；对于一个诸侯国来说，礼可以使诸侯国形成祥和的政治局面；对于天下来说，礼可以使诸侯们都能够安心顺服皇帝，从而使君臣之间的纲纪得以确立。这就是司马光的礼治观。

礼治是中国传统社会进行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最主要方式，事实上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之一。礼治的实践有赖于为政者才能和德行的匹配。为此司马光提出了自己的才德论。司马光认为“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容易看错人。由此司马光指出了一个让人沉重的历史现象：“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资治通鉴·周纪》）

乱世用人唯才是举，那是知其不可为而不得不为，而长治久安的用人策略还是要以德为先。所以治国治家者一定要仔细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权衡才与德之轻重，以防失去真正的人才。司马光指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资治通鉴·周纪》）《资治通鉴》开篇所记载的三家分晋的历史背后，恰恰就存在着一个才大于德的典型人物智伯。所以司马光在其第二篇“臣光曰”中就提出了一个貌似很极端的用人观：“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资治通鉴·周纪》）

总之，礼治思想和德治理论是贯穿《资治通鉴》中的重要思想。礼治思想是意识形态的最高准则，德治理论是社会治理的执政纲领。礼治不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伦理道德修养的规范准则、风俗美化的源泉。“立政以礼”则是贯彻基本原则的思想路线，而教化是礼治和德治的具体实践。司马光认为：“夫为国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礼，怀民以仁，交邻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节，百姓怀其德，四邻亲其义。”“君明臣忠，上令下从，俊良在位，佞邪黜远，礼修乐举，刑清政平，奸宄消灭，兵革偃戢，诸侯顺附，四夷怀服，家给人足，此太平之象也。”（《资治通鉴·秦纪》）

这可以说是司马光理想的治国蓝图，在《资治通鉴》的不同卷册中有多处大体相似的表述。历史证明，礼治思想和德治理论是有生命力的。《资治通鉴》所倡导的“立政以礼”和“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与为人为官之道，至今仍然有其借鉴意义。

史学漫谈

“统”“兴”为常，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如下一些主要特点。

一脉相承，阶段明显。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某一阶段的能量耗尽了就会起变化，变化了血脉就畅通，紧接着生长、发展，如此螺旋式上升，使中华文明生命力不绝、延续至今。中华文明的发展虽有阶段性，但没有间断和转移。我们今天还能读懂数千年前的文献资料，古代经书上的格言警句还活跃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在历史演化中，中华文明的中心有过多次迁移，但整个历史都上演在欧亚大陆东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我们居住的村舍下面，也许就是某个王朝宫殿的遗址；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种挥不去、抹不掉的深沉历史感。

逐渐累积，遗产丰富。中华文明不曾间断，主要靠文明不断累积。这种累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文字记载而形成的大量书面文献资料；二是众多的实物，包括器物、遗迹、遗址等。前者如历史文献，数千年文明连续不断地记录在史籍中，仅正史就有25部之多，还有《通典》《文献通考》《通志》等大量的“政书”以及野史、笔记等。中华文明就在这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中保存着，这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发达的文明现象。后者如考古资料，20世纪以来的大量考古发现，使中华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有了越来越清晰和确切的实物证明，这是十分了不起的。

“统”“兴”为常，

“裂”“衰”为异。中华文明在统一与分裂、兴盛与衰落中交替演进，但以统一和兴盛为常态，以分裂和衰落为变态。有学者统计，自夏朝以后的约4000年间，分裂时间总计为1200余年，而统一时间则为2700多年。即使在分裂时代，分裂政权大都甘于偏安一隅，而是把追求统一作为最重要的奋斗目标。一般来说，统一与兴盛大致合拍，分裂与衰落基本同步。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文明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侯坐大，政权下移，社会动荡。同时，新的因素也在生长，周边文明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中原文明。至秦汉，我国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统一。秦代首创了大一统模式，以后各朝代对这一模式不断进行补充、修复和完善。汉王朝大启磅礴，实现了疆土、经济、政治乃至思想的大一统，显示了朝气蓬勃的气象。从此，大一统意识在中华民族心中根深蒂固，中华文明的兴衰也就随着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而不断交替。

适度开放，兼容并包。中华文明一经形成，就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能够在开放中吸收异质文明、在包容中消化异质文明、在多元融会中更新自身。纵观中华文明发展历程，并不是没有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时候，但总体上呈现开放态势。这种开放不像古希腊文明和近代西班牙、葡萄牙、大英帝国那样是全天候的开放。那种全天候的开放往往伴随着对外扩张，结果是发生大变异，分化、瓦解、衰落乃至毁灭。中华文明的开放是在保证自我生命机体存活基础上的适度开放，只要对自身不构成伤害，都能兼容并蓄。

中华文明的主要特点

□ 韩星

有所坚守而又通达，这是中华文明形态虽然变化而生命恒久的重要原因。在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无论宗派流派如何众多歧异，都能经过一代又一代思想家的努力，兼综和合、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化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原载2016年9月12日《人民日报》）

文史漫谈

韩信如何“反”用兵法

□ 张立华

汉高祖元年八月，刘邦正式拜韩信为大将。仪式结束之后，刘邦问：“将军准备用什么谋略来指教寡人呢？”韩信问道：“大王自己估量一下，在勇敢、强悍、仁爱、刚强这些方面与项王相比如何？”刘邦回：“我不如他。”韩信拜了两拜说：“我曾经侍奉过项王，请允许我来谈谈他的为人吧。”

“项王威猛异常，一声怒喝，上千人都会吓得趴在地上。但他不能任用有德才的将领，因此项王的威猛只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项王待人恭敬慈爱，言语温和，别人生了病，会心疼流泪，甚至把自己吃的东西分给别人。可到了给立功者封赏的时候，他却把刻好的大印捏在手里再三把玩，以致大印的棱角都磨没了还舍不得授给人家。因此，

项王的仁爱只不过是妇人的小恩小惠而已。”

“项王军队所经过的地方，无不横遭摧残毁灭，天下人都非常怨恨。项王名义上是霸王，实际上却失去了天下民心。所以他的优势很容易转化为劣势。”韩信说：“现在大王如果能够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英勇善战的人才，那还有什么对手不能消灭呢？把天下的城邑封给有功之臣，那还有什么人能不心悅诚服呢？以正义之师，顺从将士东归的心愿，那还有什么样的敌人不能击溃呢？”

刘邦听得心花怒放，连连感叹：“寡人悔不早用将军！今后悉听将军调度，指日东征。”之后，汉军用韩信之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平定三秦。

汉高祖二年，韩信与张耳率兵数万，欲突破井陉口攻击赵国。赵国谋士李左车向赵军主帅

成安君献计：“韩信乘胜而来，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井陉道路狭窄，行进的军队遍逾数百里，运粮食的队伍势必远远地落在后边。请拨给我3万奇兵，从小路拦截他们的粮草。您就深挖战壕，高筑营垒，坚守军营，不与交战。汉兵前不得进，退不得还，我又出奇兵截断后路，使他们处在荒野中抢掠不到食物，用不了10天，韩信、张耳的头就可送到将军帐下。”成安君却认为：“兵书上说，兵力十倍于敌人就可以包围它，一倍于敌人就可以交战。现在韩信的军队号称数万，实际上不过数千，且跋涉千里来袭击我们，已经极其疲惫。如果回避不出击，等到汉军的后续大部队来了怎么对付呢？”

韩信派人暗中打探，得知李左车的计谋未被采纳，于是在距井陉口30里处安营扎寨。之后，派万人为先头部队，背水列阵。赵军远远望见，大笑不止，因为列阵要能进能退，背水列阵实乃自断退路，为兵法之大忌。

等到拂晓时分，韩信设置起大将的旗帜和仪仗，擂鼓开出井陉口。赵军打开营垒攻击汉军，激战良久之后，韩信、张耳假装抛旗弃鼓，逃回河边的阵地。赵军果然倾巢出动，争夺汉军的旗鼓。韩信、张耳已进入河边阵地，全军将士没有退路，个个以

一当十，殊死奋战。此时，韩信预先派出去的两千轻骑火速冲进赵军空虚的营垒，把赵军的旗帜全部拔掉，竖立起汉军的两千面红旗。赵军不能取胜，便要退回营垒，发现营垒插满汉军的红旗，大为震惊，以为汉军已经全部俘获了赵国将领，于是军队大乱，纷纷落荒潜逃。汉兵前后夹击，彻底打垮了赵军，并生擒赵王。

胜利会餐时，众将问韩信：“这次将军违反兵法，背水列阵，结果竟然取胜了，这是什么战术？”韩信回答：“这也是兵法上说的，只是诸位没有留心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我军新旧夹杂，良莠难分，我又来不及训练将士，这就如同驱赶着街市上的百姓去打仗，如果给他们留有生路，那就都逃跑了，怎么能取胜呢？”

后人对韩信纵论楚汉、背水陈兵赞叹不已。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称颂韩信“抱王霸之大略，蓄英雄之壮图，志吞六合，气盖万夫”；清乾隆皇帝说：“以项羽为匹夫之勇，人人能言之；以为妇人之仁，则信所独见也。”

（原载2016年12月20日《解放日报》）

人物侧写

